

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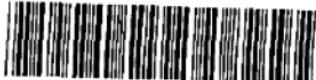
希望中的忧虑

五子登科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牛微 著





国防大学 2 060 8337 0

- 339

五子登科丛书

孩子：希望中的忧虑

牛微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孩子：希望中的忧虑

Haizi Xiwangzhong de Youlu
牛微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绥中分厂印刷

字数: 90,000 开本: 787×960^{1/32} 印张: 5^{5/8} 插页: 2

印数: 1—4,927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建忠

责任校对: 曹雅文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ISBN 7-205-02649-0/C·175

定价: 4.30元

五子登科丛书

主编 赵子祥

副主编 沈殿忠

编 委 王建忠 赵 灿

王金城 张仁斌

60A57/15

五子登科丛书

前 言

五子登科，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中国人似乎有点偏爱“五”这个数字符号，喜欢把五种事物、五个问题或五位名人等联系起来，并形成以“五”为限定的特殊语汇。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谓之“五行”；仁、义、礼、智、信五条道德规范，谓之“五常”；《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谓之“五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件人生追求，谓之“五福”。诸如此类，还把同时代的五位名人并列同称。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位春秋时先后称雄的诸侯，并称“五霸”；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宋代著名理学家，并称“五子”。不知自何人始，又将五子同科举取士的登科规矩紧密相联，于是便演变出

一种经久不衰的五子登科现象。

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历史的合理性中产生的现象，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时不容忽视的现象，也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往往令人感叹不已的现象。

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民族文化积淀中反映的现象，是把握中国传统走向时不能回避的现象，也是在文化转轨时期往往使人评说不一的现象。

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折射的现象，是了解中国社会行为规范时不能轻视的现象，也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使人惊讶不止的现象。

五子登科现象同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息息相关。它可能关系着一个人的盛、衰、荣、辱，也可能关系着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它可能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不幸，也可能改变一个人不幸的人生。

五子登科现象，并不完全是“个人烦恼”问题。从历史到现实，它早已突破了个人的狭小生活氛围，影响了一个又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影响了一个又一个群体的价值取向。

五子登科现象又早已不是某一主体或客体的专利。历史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使愈来愈多的

中国人从社会大视角去考虑更重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把同一时期里最令世人瞩目的社会问题戏称为“五子登科”。

这是一个窗口，是从外面的世界看中国社会的窗口。从这个窗口里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众相、人生百态，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是一面多么奇妙的多棱镜，是一个多么精彩的大舞台。

这是一个窗口，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看外面世界的窗口。从这个窗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难了解、不难理解的事情，也有很多我们不易了解、不易理解，甚至时常误解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时代终于为中国人提供了观看外面世界的机会。

这是一个窗口，是贯通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窗口。从这个窗口可以回顾遥远及不太遥远的历史，可以窥视复杂及不完全复杂的现实，可以展望难以预料及不是不可预料的未来。

五子登科所反映的问题，已经是历史上的问题了。旧话重提，其实是对过去的告别。尽管告别过去不容易，可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坎坷历程中毕竟告别了过去。

五子登科所反映的问题，依然是现实中的问题。旧话新解，其实是对现实的探索。尽管探索现实并不顺利，可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艰辛生活中

毕竟探索了现实。

五子登科所反映的问题，可能还是未来中的问题。新话新说，其实是对未来的寻求。尽管寻求未来并不轻松，可是中国人在卸下自己背上重负的同时毕竟不懈地寻求了未来。

如果说在五子登科问题上有那么多的误区、那么多的漩涡、那么多的病态，那么，这一切都不足为怪。误区和病态确是一种不幸，但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有信心、有能力摆脱不幸。

五子是中国的五子。

登科是中国的问题。

你愿意走入中国社会的深层吗？在五子登科问题这里或许会发现一点线索，或许会找到一条路。当然，它不是唯一的线索，也不是唯一的路。

编 者

1992年11月

五子登科丛书

目 录

前言	(1)
一、国策效应	(1)
1. 多未必是好	(1)
2. 不能选择的选择	(7)
3. 太阳出世	(11)
4. 褶襟中的一代	(17)
5. 中国家庭第一消费	(21)
6. 透视“压岁钱”	(25)
7. 侍候不好的“小皇帝”	(30)
二、望子成龙	(36)
1. 养孩子与买彩票	(36)
2. 难以招架的“从娃娃抓起”	(41)
3. 种瓜未必得瓜	(45)
4. 世界“棋后”的启示	(49)
5. 父债子还	(53)
6. 家庭AA制的联想	(57)
三、爱的误区	(62)

1. 倾斜的天平.....	(62)
2. 狼乎？羊乎？.....	(67)
3. 相通的极端：溺爱与专制.....	(70)
4. 纨绔遗风.....	(76)
5. 孩子身上的铜臭气.....	(80)
6. 爸爸妈妈不再是夫妻.....	(85)
四、难为师表.....	(91)
1. 大教育 穷教育.....	(91)
2. 警报：30 000 000文盲后备军！.....	(95)
3. 学校已不再神圣.....	(101)
4. 旧语新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	(104)
五、分数的奴隶.....	(109)
1. 小学生 大书包.....	(109)
2. 考试王国.....	(113)
3. 六十分万岁——大学生们的省悟与迷茫.....	(117)
4. 金字塔开始动摇.....	(122)
六、八方诱惑.....	(126)
1. 电子游戏厅里的童子军.....	(126)
2. 麻坛“新秀”.....	(130)
3. 校服与名牌的较量.....	(135)
4. 校园中的礼尚往来.....	(139)
5. 神秘的伊甸园.....	(144)

七、成人世界	(149)
1. 东方迪士尼之梦.....	(149)
2. 拍花贼又来了	(153)
3. 谁生产儿童精神营养液.....	(156)
4. 禁止童工的喜与忧.....	(160)
5. 改革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164)



国策效应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造就了中国城市421和2+1的家庭结构。这个“1”就是独生子女，他们是千百万个家庭中的“小太阳”，系着年轻父母们的欢乐和烦恼，反馈出基本国策的正负效应。

1. 多未必是好

中国人对子女的重视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在古代，对人的祝愿最好莫过于多子多福；最坏莫过于断子绝孙。结婚以后没有孩子，不仅没有了将来的希望，而且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所谓鳏寡孤独这些不幸的人中的“独”，

指的就是年老而无子女的人。在家庭中，对于晚辈来讲，多子多嗣是孝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长辈来说，子孙绕膝则是最大的福分。有诗为证，“门前车马非高贵，家有儿孙不算穷”。子孙众多，世代绵延，烟火不绝，这是中国古人的一大人生追求。

即使是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当法国妇女致力于保持自己苗条的形体而恐惧生儿育女，美国妇女醉心于愉快的旅游而极力摆脱子女托累，德国妇女人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而无暇他顾，就连世界公认传统、贤惠的日本妇女也爆出冷门，不要做家庭的奴隶的时候，70—80%以上的中国妇女却还在执著地为传宗接代锲而不舍地奋斗着。仿佛女人来到人世上，不为丈夫多生几个儿女便有些失职，而男人没有创造出几个活鲜鲜的生命来繁荣家族、延续香火便也对不住祖上。

中国民众这种生育观，认真追溯起来，应该说主要来自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力，使人成为简单的劳动力，生孩子就是生产劳动力，而劳动力便是财富的源泉。几千年来，中国一向是以家庭、家族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人并不是以个人立身于社会，而是带着浓重的家族背景参与社会生活的。因此，家庭劳动力的多寡，便成为家族是否兴旺发

达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的“多子多福”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所鼓励。古书上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于统治者来说，无论分时、合时，人多都是一件好事。分时战乱纷起，人多壮丁多，打起仗来，人多势众；合时太平盛世，人多税多，可使皇帝老儿的腰包更鼓些。

由于在生育观上官民一致，中国人口从17世纪下半叶突破1亿大关以后，便急剧增长。中间虽然太平天国革命的悲剧结果，曾使人口学家们从某种角度看到了一点人口困境的转机：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清代人口减少了1亿多，几乎达当时总数的1/3。但由于中国刺激人口增长的小农经济体系没有动摇，新的政治与生产关系稍事调整之后，人口又迅速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起加倍膨胀起来。特别是到了1949年之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民众最后摆脱了战争、贫困、疾病等大的灾难的困扰，生活有了保障，人口便以更快的速度膨胀起来，以至于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以“人口爆炸”来概括这种急剧增长的趋势。

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49—1981年间，中国平均每隔6.4年就增加1亿人！1981年，平均每分钟出生33人，而到1987年已达每分钟40人！因此，即使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在未

来的20年内，中国还要增加2亿多人，相当于近1个美国或2个日本！可谓多也！然而，多未必是好。不断增长的肚皮则要靠不变的，甚至是逐年减少的自然资源去充填的。据专家统计，到2000年，仅填饱人们的肚子，每年至少就得增加9千万吨粮食，而那时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已经下降了1/6。事实上，“地大物博”早已被“人口众多”给“平衡”了，变成了“地窄物薄”。目前，在人口的恶性膨胀下，虽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的前几位，但人均数却远远地排在了后面。人均耕地和人均森林面积及林木蓄积量都不及世界人均数的1/3，人均占水量仅居世界第88位，人均占有粮食数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1986年，我国国民收入平均增长了9%。这个速度在世界上也是快的，可人均水平却不高。1987年比1986年新增国民收入782亿元，可平均每人仅增70元，每天仅2角多钱。一天多吃一个鸡蛋，新增财产就吃掉了。1977年以来，北京市平均每年新建住房达430万平方米左右，但按每新增人口需8平方米计算，40%的新建住房将被新增人口吃掉。

其实，多未必是好，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明白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过人们：

“今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中国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这是马克思早已预见到的。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了世界之最，终于形成了一个最大的潜伏危机。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当她的缔造者毛泽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自信驳斥艾奇逊所谓“共产党最终将无法解决众多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时，似乎忽略了真理与谬误之间有时只有一步之差这个认识法则，得出了一条“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的结论。以毛泽东特有的地位和崇高的威望，这个结论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人能够纠正的。

当然，中国也不乏有识之士。1957年，年逾古稀的马寅初老人在浙江多次实地考察后，提出了“新人口论”，对中国人口增殖过快表示忧虑；同年，前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惠澜也通过严格的计算提出如果人口政策不变，20年内，中国人口将达10亿人的严重警告。可悲的是他们二人双双被当作中国的马尔萨斯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更可悲的是他们的预言却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实。由于对生育的放纵，带来了人口的恶性膨

胀，加之建国后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无疑刺激了人口的生产。1962—1975年的14年间，中国出生的人口达3.5亿，而这个数字则是中国社会从公元前夏禹时代到1820年清仁宗嘉庆年间历经4000年人口发展才达到的数字！

更严酷的现实是经济的惩罚。1958—1978年20年间，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没有多大改善。农民年收入六、七十元。工人月工资六、七十元。究其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左”的路线的恶果，但从国民生产总值上看，毕竟年年都有所增长。遗憾的是，这种缓慢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的急剧膨胀抵消掉了。但问题远远不止于此，随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就业、住房、交通、环境等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使人应接不暇。

现实终于使一向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骄傲的中华民族意识到，多未必是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经济短缺的国家来说，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只能加剧各种矛盾的激化，陷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中国决策层终于痛下决心，实行计划生育，采取国家干预的手段，切断经济落后与人口膨胀这个恶性循环的链条。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写进国家宪法，这是世界性的创举。它表明了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生